



Li Huanying and Kim Ji-young: "Othering" of the Mother Image

Duo Y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China

Email address:

shirleycomingtoyou@163.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Duo Yang. Li Huanying and Kim Ji-young: "Othering" of the Mother Imag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2, No. 1, 2021, pp. 1-4.

Received: February 15, 2022; Accepted: March 2, 2022; Published: March 9, 2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ssues about women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Films and TV dramas about women have been launched continuously. The film "Hi, Mom" and "Kim Ji-young: Born 1982" have caused phenomenal discussion as soon as they were released. The paper focuses on mother images of the film "Hi, Mom" and "Kim Ji-young: Born 1982", and combines the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film markets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 to compare the mother images in film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othering of the mother image in the film "Kim Ji-young: Born 1982" is a conscious construction, while that of "Hi, Mom" is in an unconscious state.

Keywords: Othering, Mother, Film and Literatur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李焕英与金智英：母亲形象的“他者化”

杨朵

江苏大学文学院，镇江，中国

邮箱

shirleycomingtoyou@163.com

摘要：近年来，女性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女性的影视剧作品也不断上线，引起众多关注和讨论。中韩电影《你好，李焕英》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一经公映即引起了现象级的讨论。本文以中国电影《你好，李焕英》和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母亲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和韩国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电影市场来对比分析中韩电影中母亲形象被“他者化”的具体呈现、差异和原因。经过研究发现，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母亲形象的他者化是自知且自觉的主动建构，而《你好，李焕英》则是不自知且不自觉的状态。

关键词：他者化，母亲，电影文学，中韩对比

1. 引言

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往往牵涉到传播主体对女性的叙说立场和叙说方式问题，它们往往受制于话语权力现实和性别意识形态观念[1]。在男权社会的性别观念中，女人成为“母亲”——生儿育女才能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与自然使命，而这种观念在电影《你好，李

焕英》和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则表现为传播主体对女性形象的“他者化”建构。

在前现代语境中，“他者”是“我们”的对立面，是被模糊化的“异端”，由于对他者感到陌生和恐惧，因此人们将他们驱逐出去，以构建一个安全的环境。而在现代语境中，他者是一种现代价值的反叛和理性秩序的对立面。鲍曼认为流动的社会中那些“陌生的、不同的、不确定的、可怀

疑的”秩序的破坏者，都是“他者”[2]，而人们将其区隔在主流社会之外，置其于边缘地带，其主要是为了达成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建立并维持现代生活的秩序[3]。这种“他者”身份在近年来的电影中被反复强调，在电影《你好，李焕英》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两位母亲皆是他者形象，主人公李焕英和金智英只能被“他者化”以维持整个电影叙事秩序的平衡。

2. 母亲被“他者化”的具体呈现

由他者所衍生出的“他者化”指人们通过将负面特点加诸他者（其他群体或其他个体）而获得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4]。电影《你好，李焕英》中的主人公李焕英和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主人公金智英都是母亲。无论是开朗灿烂的李焕英，还是绝望抑郁的金智英，二者虽然在外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本质都是被“他者化”了的母亲形象。

2.1. 李焕英：追忆中的完美母亲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结尾反转了剧情：李焕英先于女儿贾晓玲穿越。在贾晓玲“从天而降”穿越回过去时，是李焕英先跌落在路上的树叶堆里接住了她，影片的开头便奠定了母亲为女儿付出，甚至不惜生命代价的人物基调。李焕英对抢夺电视机、排球比赛、联谊、文艺演出都没有兴趣，她是为了女儿开心才去参与这些事情。李焕英穿越回到了少女时代，也是为女儿而活。

甚至严格来说，电影主角不是李焕英，而是贾晓玲，故事由贾晓玲推动，李焕英的情绪行为也由女儿牵动，她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在电影开头出现的中年时代的李焕英，比较贴近一个真实的母亲——望女成凤、喜欢和街坊邻居比较儿女，是一个生活在人间烟火里、每天操心着生活中鸡皮蒜毛的小事的母亲，可是穿越回到少女时代的李焕英，则更像一个“天使”——姣好的面容，带着浅浅的笑，总是编着两条干净整洁的辫子，善解人意、温柔大方，几乎没有缺点，这符合了大众心目中完美的母亲形象，而不是一个富有个性的自我。女儿贾晓玲认为李焕英嫁给厂长的独子沈光林就能帮助母亲改变命运，也就是所谓的“嫁入豪门”，这仍然顺应了父权社会的传统，女性必须被组织到婚姻制度当中，需要依靠男性才能改变人生。

2.2. 金智英：现实困境中的抑郁女性

进入现代社会，女性在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仍旧是弱势一方，面对男性制定的种种规则，弱势个人与强势社会的冲突必然会通过各种形式凸显[5]。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开头便呈现了金智英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境遇。金智英在生下女儿后辞去工作，当了全职妈妈。她在带女儿出去散步的时候，买一杯咖啡都会被路过的上班族嘲讽为“好命”“花着丈夫赚的钱消遣”的“妈虫”。与此同时，金智英也被排除在家庭之外。金智英回男方家里过年，当公婆、丈夫、女儿和刚刚回娘家的小姑子在聊天休闲时，只有她在厨房里准备食物，厨房和客厅似

乎有着不可僭越的分隔线，这条线，将金智英排除在外。金智英自己的家庭则是典型的重男轻女的家庭。爸爸只记得儿子喜欢吃豆沙包，妈妈为了家庭牺牲自己想要当老师的梦想。丈夫大贤想要申请育儿假，让金智英重新回归工作的想法被婆婆知道之后，金智英被婆婆斥责“去上班又赚不到丈夫那么多钱”，她赚到的钱可能都不够承担女儿托儿所的费用和保姆的工资，这番议论中隐含了一种“关心妻子的男人就不应该拥有事业”的强盗逻辑[6]。金智英的价值被抹杀了，比起去上班，在家带孩子才是她应该做的事情，正如她被那些上班族贬低为“妈虫”一样，是寄生于丈夫、没有自我价值与生存能力的人。这些都是金智英“他者化”的外在体现。更加内在的体现是金智英失去了自我，她会无意识地“变形”成其他人，借由其他人的身份说出压抑在心中的话语。

在整部压抑的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给予了观众一缕和煦的“春风”——金智英重新回归职场，追寻她的梦想。这个略显乌托邦式的结尾或许可以看作是商业结构内制作的电影给观众留下的唯一安慰。

3. 母亲被“他者化”的原因

电影中李焕英和金智英这两位母亲形象皆被“他者化”，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传统观念对母职的束缚以及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往往会出现主体困惑的问题。

3.1. 母职束缚

母职是指女性在人类繁衍过程中对母亲这一角色的担当与认同，即包含了怀孕、生育、养育孩子的过程[7]。母职行为是由社会建构的，通常不具有自主性。父权社会普遍认同和接纳的母亲角色与家庭、养育孩子密不可分，这显然将母亲排除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外。在性别社会建构影响之下，女性尤其是母亲难以在职场中回避由性别造成的偏见，她们的社会形象和社会价值往往得不到认可，甚至被贬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中指出：父系社会的存在前提是女性，父系社会不能没有女性，无法排除，因此家庭便发挥了另一个作用就是将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8]。父系社会在建立之初就把母亲桎梏在了固定的职能之中，女性要成为发挥作用的工具才能被纳入体制，因此，社会也就逐渐将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的母亲视作理所应当。在电影中，鲜少出现的“穿越前”的母亲李焕英在镜头中都是在替女儿洗衣和做饭，操心女儿的学业和前途。当金智英想要反抗，重回职场时遭遇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业务能力超群的金组长为了工作难以兼顾家庭，在组会上受到男同事的冷嘲热讽，公开指责金组长不是一位称职的妈妈。电影中出现的这些画面无不是将母亲排挤在了社会之外，母亲注定是要遭受边缘化的差别对待，成为社会文明之外的他者。在性别社会建构影响下，女性不仅在家庭场域中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的规训，在职场中同样无法回避由于性别造成的偏见[9]。

即便女性具有超凡的智力和才华,也很难在社会中找到适合并得以施展才华的一席之地。金智英有着较高的学历,业务水平优秀,但还是在职场中难以晋升。因为当女性试图反抗原先的母职桎梏时,她将被社会视为是不合规范的、无法归入既有的系统之中,她破坏了秩序和规则,因此便会被排斥在秩序之外。许多韩国母亲在生完孩子后仍然失业,成千上万的女性在成为母亲的同时失去了一半的社会身份。

3.2. 母亲的主体困惑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在孩子身上会找到充实的感觉,她们享受自己对于孩子的“必不可少”[10],这表明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自我意识和个性容易被“母性”取代,这就导致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会出现主体困惑的问题,即“我是谁”的问题。金智英是一位家庭主妇,是一位妻子,又是一位模糊的母亲。李焕英也不是自己,她是一位母亲,一位没有明显自我特征的“模糊的母亲”,观众都能看到母亲的轮廓——美丽、善良、温柔、开朗大方,但是这个母亲没有具体的五官,她是全天下母亲的代称,而不是李焕英自己,在电影中很难看到李焕英的自我特质和个性。

父权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女性的牺牲献祭为前提,女性尤其是母亲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抹去自身的性格与特质,长久以往,便陷入了一种主体认知困惑的迷宫中。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这一点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金智英遭受的主体困惑在电影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其“变形”,也可以理解为她所患的“精神疾病”——她在精疲力竭到不堪重负时会变成另一个人,可能是她的姐姐或是妈妈甚至是外婆,可见在金智英的无意识中,她已经迷失了自我的身份,不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认同,她渴望借助“变形”成这些女性长辈获得话语平权。在平日里的金智英,被排除在话语体系之外,不仅没有属于自我的话语体系,更多的时候是没有说话的权利,她终于在精神陷于崩溃之际成为“另一个人”,开始逐字逐句地说话。

4. 母亲“他者化”的中韩差异

虽然两部电影都表现出了母亲形象的“他者化”现象,但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他者化”是一种不自觉且不自知的过程,而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他者化”是一种自知且自觉的过程。

4.1. 李焕英: 不自觉且不自知

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他者化”是一种不自觉且不自知的过程。导演贾玲在采访中说自己想要拍电影,是为了表达自己心中关于母亲的遗憾,从这样的初衷出发,电影应当不会有意呈现被他者化的母亲形象,这表明导演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这样的陷阱。这也许与中国的电影市场有关。

不同于韩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高速、高质量发展,中国的现实主义影片发展较为曲折。明星效应及全球经济

发展消费主义泛滥,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市场越来越狭窄。观众沉浸在越来越多的低俗娱乐电影之中,现实主义创作中那些不加修饰的影像及稍显沉重的存在主义叙事倾向使得它受到大部分观众的冷落,也正是市场的冷淡扼杀了现实主义电影的诞生[11]。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市场存在“吃力不讨好”的情况,票房也较为惨淡。2014年,贾樟柯执导的现实题材电影《山河故人》入围了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在中国仅收获3222万票房。

在《你好,李焕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二十的影片中,没有围绕女性展开叙事的影片,甚至在制作团队上,也只有薛晓路一位女导演上榜。由此可以推断出如果《82年的金智英》这样一部现实主义女性电影在中国上映,大概率会遇冷。基于这样的市场环境,首次执导电影的导演贾玲选择了一种较为保险和稳妥的方式。影片由“贾玲+张小斐+沈腾”铁三角的喜剧组合主演,其中也加入了许多男性喜剧中常出现的爆笑桥段。

观众除了对于电影类型有特定的偏爱,对于母亲的形象也存在一种固定的印象,能够获得大众支持和共情的母亲形象是显而易见的。影片中美丽活泼、善解人意、麻利能干的李焕英是大众心目中理想的母亲形象,再加上电影中的感人情节,从而更容易获得观众的支持。

4.2. 金智英: 自发且自觉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他者化”则是一种自发且自觉的过程,导演有意将这种社会现象表现出来,残酷地展现当今女性尤其是母亲的社会边缘地位和她们的迷茫困惑,电影所展现的母亲形象“他者化”旨在揭露赤裸裸的现实,唤醒更多在父系秩序下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的民众。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比其他艺术媒介更直接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12]这也许与韩国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联系。

首先,韩国社会存在鲜明的阶层矛盾,这在此前大热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虫》中有着充分体现,阶层固化十分严重,贫困的阶层越来越来贫困,而处于上层阶级的财阀则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小的阶层流动性使得“子一代”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也无法摆脱阶层的桎梏。韩国青年人普遍认为,父母拥有的资本状况,尤其是拥有经济资本的状况决定了自己的社会阶层[13],正是基于这一残酷的社会阶层现实,加剧了韩国社会的男女两性矛盾。因为阶层固化加重了韩国新一代年轻人的负担,他们被称为“88万韩元世代”(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只有88万韩元,约等于5000多元人民币)[14]。随着韩国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自我意识觉醒,男性便遇到了更加激烈的求职竞争。而此前,女性往往学历更低,在家中做家务劳动,当时代发展,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女性终于从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男性便感到了职场的危机和竞争的压力,仇视女性的情绪不断上升。

近年来,“ME TOO运动”韩国女子梨花大学“姐姐来了”等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不断升温,政府不断拥护女权主义的行为使得韩国男性“厌女”心理加剧。基于这样尖锐的阶

级、性别矛盾和韩国女权运动不断兴起的社会现实，韩国女性已经做出了反抗。导演金度英选择的反抗方式则是拍摄这样一部女性电影，让更多的女性尤其是母亲免于成为“金智英”。

导演贾玲在接受采访时被提问：“喜剧的底色是不是悲剧？演员的痛苦要展示还是隐藏？”，论及这些问题，贾玲的回答是“大可不必”，“我的价值就是我的情感，我的牵绊就是这些东西”[15]。由此可以推测她拍电影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拍即所感。从电影的超高票房和话题讨论度上，贾玲的情感明显引起了观众的共情，是十分成功的。但是正如贾玲在采访中不愿深入提及喜剧的内核和演员的表演，这部电影势必存在落入男性凝视下喜剧片的窠臼。电影中的李焕英或者说整部电影仍然在男性的审视之下，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他者化”女性的陷阱之中。不同于贾玲将想要表达的炽热情感倾注于电影《你好，李焕英》，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导演金度英以克制的情绪和气氛引导了整部电影，尽可能地控制了感性的介入，呈现了金智英这位迷茫无措的女性被排挤在社会之外、家庭边缘的他者形象，真实地展现了现代女性生存的困境。

5. 结语

中国电影《你好，李焕英》和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都将视点聚焦于母亲，构建了被他者化的母亲形象。即使两部电影中他者化建构的表征方式存在差异，《82年生的金智英》是自知且自觉地主动建构，而《你好，李焕英》则是不自知且不自觉的状态，但无论是外显的“他者化”还是隐形的“他者化”，从《你好，李焕英》和《82年生的金智英》的背后，皆可以察觉到当今母亲所处的困境。电影只是现实的部分缩影，现实中的母亲可能遭遇着更大的挑战与困难。从现实中的抑郁母亲到真正自由的母亲，这两者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基金资助

江苏大学2021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编号202110299668X）。

参考文献

- [1] 余霞，于泓。反他者化：微电影广告女性形象研究[J]。东南播，2017（06）：125-127。DOI: 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17.06.041。
- [2]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60。
- [3] 敏芝。韩国电影《流感》的“他者”与“归途”重释[J]。电影评介，2020（06）：21-25。
- [4] 单波，张腾方。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他者化难题[J]。学术研究，2016（06）：39-45+73+2。
- [5] 丛楠。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和抉择——基于农村年轻女性婚姻问题的案例[J]。法制博览，2019（26）：257。
- [6] 陈琳。从《82年生的金智英》看时代病症与女性性别困境[J]。电影文学，2020（07）：134-136。
- [7] 吴玉娟。“他者化”的母职：新手妈妈育儿信息接触与身份认同研究[D]。暨南大学，2020。
- [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9] 刘垚娜。规训社会下的女性困境——以《婚姻故事》与《82年生的金智英》为例[J]。艺苑，2020（03）：31-33。
- [10]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39。
- [11] 康璐晨。新时期中国商业化趋势下的现实主义电影——以贾樟柯电影的商业化之路为例[J]。传播与版权，2017（04）：84-85+90。
- [12] [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M]。黎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3] 严飞，崔峨理河。韩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点及趋势[J]。国外理论动态，2020（04）：158-166。
- [14] 王晓玲。韩国女性话题背后的阶层矛盾与社会分裂[J]。世界知识，2020（01）：69-71。
- [15] 于蒙。好风光[J]。风尚志，2012（79）。